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SHANGHAI  
TONGSHI  
MINGUO JINGJI

K295.1  
X68a6

# 上海通史

熊月之 / 主编

第 8 卷

## 民国经济

本卷主编 潘君祥 王仰清

潘君祥 王仰清 张 剑

樊卫国 宋钻友 顾柏荣

马学强 著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A0909479

# 第一章 “大上海”经济地位的确立

从 1912 年起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治理开始,历经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治理的前期,在 30 年代中期,上海的经济达到了本世纪上半叶的顶点。在这一时期里除了少数时段,上海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究其原因,除了维持着被迫开放的大格局和大量外资企业的经营发展外,民族资本的崛起和政府推行着相对比以前更多的有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政策是其主要原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的中心,也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成为国内最大的轻纺工业基地和交通运输枢纽。这些经济功能的发展和相互作用,使上海赢得了“大上海”这一显赫称号,成为对全国城乡吸纳和辐射能力最强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

## 一 “黄金时期”的到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提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经济政

策也更加有利于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的成功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创办实业、发展经济的热情,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及其他批文中多次指出:民国初立,“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sup>[1]</sup>。他认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已具备了良好条件,并认为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国必然会有许多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海的资本家阶级更是活跃异常,经济团体纷纷成立,并积极开展活动。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以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工业发达为宗旨”<sup>[2]</sup>。中华实业团“以谋国民经济之发达,助共和政治之进行”为号召<sup>[3]</sup>。由华侨资本家组成的同仁民生实业会也在上海设立总会,并在全国各地组织活动。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资本家阶级的积极活动,辛亥以后上海新开设的工厂企业明显增多。据罗志如编《统计表中之上海》所记,1911年上海新开设的工厂只有9家,1912年就增加为28家,1913年为29家,至1914年时为26家<sup>[4]</sup>。凡纺织、化学、食品、印刷、机器、器具、日用品和其他工业行业都有企业创建。尽管这一统计数字不尽完全,而且其中还包括开设的外资企业,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增长较快的势头。

辛亥革命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给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取得更加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可能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间的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商品市场的压力,上海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于是获得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工商各业短期都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国帝国主义虽然力图恢复原来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但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相对发展壮大,加上历次抵制外货运动和资产阶级对发展民族经济的积极

倡导,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从1915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强暴要求开始,国内掀起的抵制外货运动风起云涌,连绵不断。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有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抵制日货运动,1923年因要求收回旅大而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的抵制日货和英货的运动,1927年因日本出兵山东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1928年因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1931年又因日军侵占东北而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等。同这种间歇性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相随的是持久发展的提倡国货运动。这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整个20—30年代的连绵不断的提倡国货运动曾有力地推动着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前后20年左右曲折而又持续不断的发展,其前期,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sup>[5]</sup>。这种情况正像那时在沪的外国海关人员所估计的那样,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给予上海经济迅速发展的某些条件将逐步丧失,“可是一种健康的经济活动局面已普遍出现。同前一个时期由于一时的条件使得工业投资颇具魅力的现象相比,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项目可以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新设的工厂多种多样,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sup>[6]</sup>

以棉纺织业为例,1914—1919年期间上海华商纱厂的纱锭数增长34%,在1920—1924年期间继续增长了123%,在1924—1929年间又增长了20%<sup>[7]</sup>。上海华商布厂的布机数在1919—1931年期间共增长了293%<sup>[8]</sup>。以企业来分析,1915年荣氏兄弟在上海开办了申新第一纺织厂,1916年时棉纱产量为3584件,1917年时增加为9723件,同时增设布厂,购置布机350台,生产棉布29002匹。1918年共生产棉纱9811件,又增添布机250台,棉布产量增加到128719匹<sup>[9]</sup>。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申新企业又乘全国各地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热潮,增加生产,企业业务继续发展,不但老厂继续扩建,而且还发



图 1-1 二三十年代纺织厂清花车间女工在操作

展了不少新厂<sup>[10]</sup>。自 1911 年至 1936 年上海棉纺业的发展可见下表。

表 1-1 上海棉纺厂数量、设备及资本统计表

单位：国币元

年份	棉纺厂数	纱锭数	设有布机厂数	布机台数	棉纺厂资本数
1911	7	172116	3	1400	4633333
1913	6	146440	2	1100	—
1925	22	677238	9	5090	48629576
1931	28	1066920	13	7244	—
1936	31	1114408	16	8754	69419072

资料来源：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 10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75 页表列数字综合。

针织业的发展也是如此。1918 年时上海的电机针织厂只有 8 家，到 1922 年时发展到 10 家，1928 年时已达 35 家<sup>[11]</sup>。其他如上海的橡胶业、火柴业、水泥业也无不获得相应的发展。

上海的另一大支柱产业机制面粉工业的情况同样如此。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面粉加工业带来的国内外市场，上海的面粉工业从原来的 5 家增加到 1920 年的 20 家，工厂数占全

国面粉厂的 14.8%，生产能力达 93500 包，占全国的 30.3%。大量产品被运销各地，不少还出口外洋，具体情况可见下列诸表。

表 1-2 上海面粉运销外埠数量表<sup>[12]</sup>

单位：关担

年份	数量	指数	年份	数量	指数
1913	1492440	100	1918	2922758	195.84
1914	1859797	124.61	1919	3264383	218.73
1915	2809206	188.23	1920	2853688	191.21
1916	2568465	172.10	1921	3255944	218.17
1917	2858762	191.59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18—119 页。

表 1-3 全国和上海面粉出口数量表<sup>[13]</sup>

单位：关担

年 份	全国出口数量	上海出口数量	上海占全国%
1914	69392	—	—
1915	196596	118318	60.18
1916	289747	184312	63.61
1917	798031	123951	15.53
1918	2011899	1531756	76.13
1919	2694271	1837697	68.21
1920	3960779	3315575	83.71
1921	2047004	1439535	70.32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18—119 页。

由于这一时期商品畅销，上海面粉厂的盈利率很高。例如，在 1916—1921 年的 6 年中，福新面粉一厂的资本盈利率为 127.63%，比当时的纺织厂（例如申新一厂）的资本平均盈利率要高一倍以上。进入 20 年代以后，上海的面粉行业也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进入困难境地，特别是一些大企业都能以自身的设备、技术优势，加工进口小麦，

扩大生产和销售,并获得较好的利益。在1921—1936年期间,上海进口小麦数占全国进口数基本稳定在85%左右,大多为上海面粉厂所消化,致使上海面粉厂使用洋麦数量超过了使用本麦数量。在20年代,上海面粉厂的产销量还只占企业生产能力的56%,在30年代,上海面粉厂的产销量就占企业生产能力的80%。由于以进口麦作为原料,上海企业生产成本较低,所以上海产品销往各地的价格一般都低于当地和外埠的产品,有时甚至低于削价的进口面粉。所以上海面粉工业这一段时期的发展被一些研究者称之为与全国情况有所不同的“独特发展时期”。<sup>[14]</sup>



图 1-2 码头上装卸面粉的情景

以上海工业产值较高的卷烟工业为例,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时期,还是行业的发轫时期。行业一度有所发展,卷烟机数达16部,职工人数达480人,但终被外资企业所排挤吞并。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卷烟业再度复兴。1920年时卷烟机数增至105部,职工人数达5500多人。在近10年的时间里,行业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发展,至1930年时,卷烟机的数量更增至543部,职工人数

几达 19700 人。在 1937 年以前,卷烟机数量仍维持在 500 部左右,职工人数则在 17000 人左右波动。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表 1-4 1911—1936 年上海卷烟业情况统计表**

年份	厂数	卷烟机(台)	资本(万元)	产量(5 万支装)箱	产值(万元)
1911	1	1	1	360	4.8
1924	16	113	984	73080	984.2
1925	52	176	1010	116200	1565.0
1928	101	414	1398	282485	3804.5
1931	79	540	1669	519155	6992.0
1932	75	535	1659	568524	7656.9
1933	58	519	1867	473272	6374.0
1934	53	495	1819	508337	6846.3
1935	49	482	1793	426378	5742.5
1936	44	474	1777	384600	5179.8

资料来源: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 10 辑,第 104—105 页表列数字综合。

在这期间不断有新的卷烟厂增设,同时也有旧厂关闭歇业<sup>[15]</sup>。各家烟厂盈利的具体情况也有不同,以上海最大的卷烟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成公司为例,可以列表如下:

**表 1-5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和华成烟草公司盈余统计**

单位:1925—1934 年为万银元

1935—1936 年为万法币

年份	南洋盈余	华成盈余	年份	南洋盈余	华成盈余
1925	57.2	33.8	1931	22.4	150.3
1926	119.2	88.1	1932	49.0	174.3
1927	23.8	119.3	1933	104.7	159.8
1928	-196.1	204.8	1934	63.5	110.6
1929	-245.2	13.3	1935	10.3	131.5
1930	-85.8	83.1	1936	13.1	93.4

资料来源: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75 页数字;方宪堂主编:《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8 页数字。

缫丝行业的发展大体上以 1930 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 1911 年至 1930 年期间，上海的缫丝业总的来讲呈向上发展的态势，而在 1931 年以后至 1936 年时，则出现了较大的滑坡，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表 1-6 上海缫丝厂家数及设备统计(1911—1936 年)

年份	厂数	缫丝车数	年份	厂数	缫丝车数
1911	46	13062	1924	72	17554
1912	48	13392	1925	75	18298
1913	49	13392	1926	84	19490
1914	57	14964	1927	93	22168
1915	57	14964	1928	104	24375
1916	61	16288	1929	104	23582
1917	69	18802	1930	111	26175
1918	68	18800	1931	70	18326
1919	65	17752	1932	53	13476
1920	63	18146	1933	44	10730
1921	58	15770	1934	35	8270
1922	65	17260	1935	39	9060
1923	67	18212	1936	49	11116

资料来源：据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2、327 页上的表列数字综合而成。

丝织工业与缫丝行业有着基本相同的情况。在 1915 年至 1927 年期间，上海较早地产生了大中型丝织厂 20 多家，共拥有电力织机 1647 台，平均每厂 80 台左右。在 1928 年至 1931 年期间，上海又开设了 475 家小型的丝织厂，其中 353 家丝织厂的电力丝织机都在 10 台以下，出现丝织小厂大量涌现的景象，这是上海丝织业的又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小型丝织厂的大量涌现，说明了该行业有利可图，行业仍在向前发展。但从缺乏大型电力丝厂的诞生来看，又说明这种发展基础并不稳固。果然，在 1931 年以后，由于受日帝侵占东北三省，北方市场销路被夺，发展停滞。加上连年水灾，农村破产，购买力下降。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企业生产立刻遇到了困难。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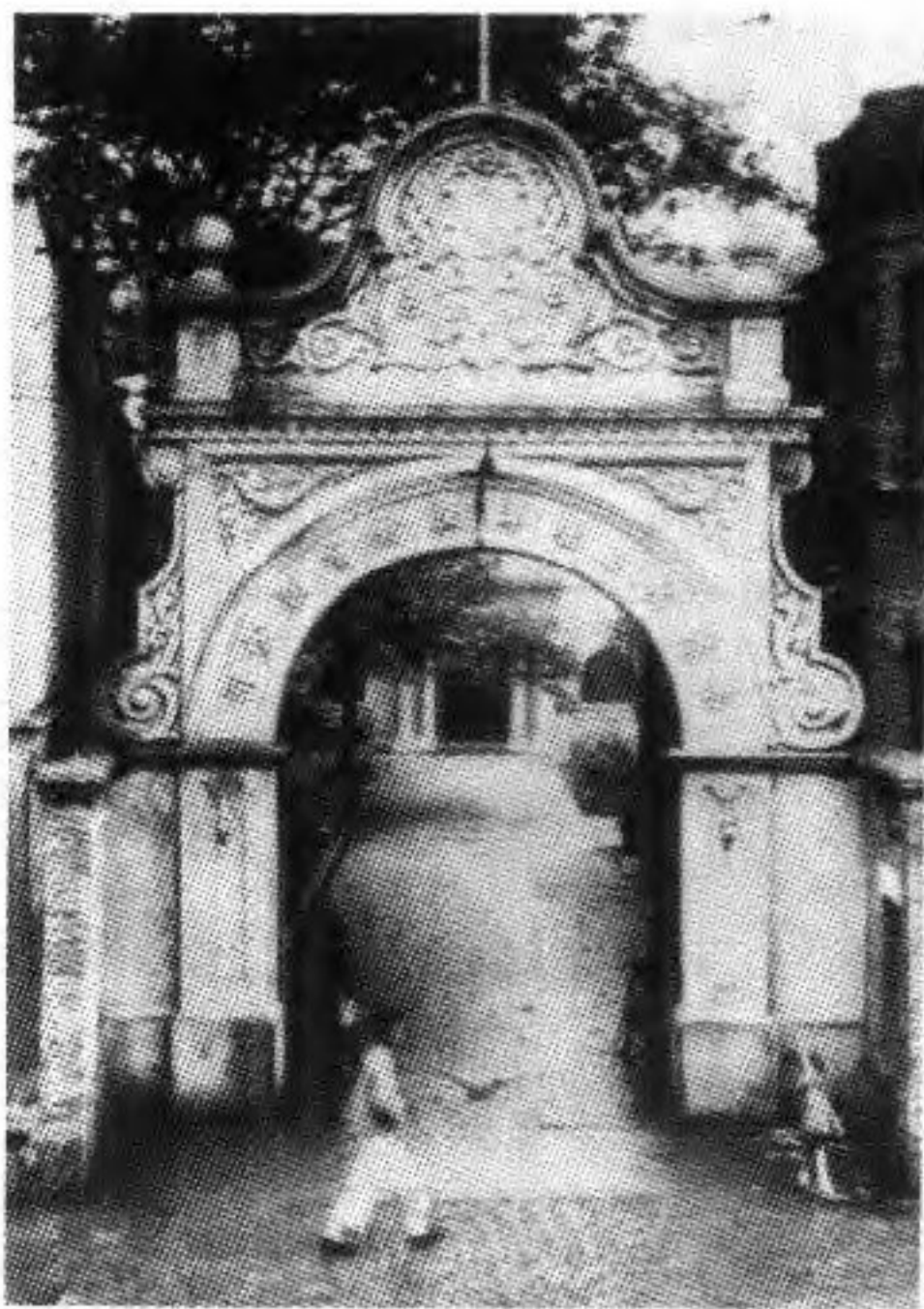


图 1-3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门景

情况直至 1936 年以后才又见好转。<sup>[16]</sup>

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是上海工业发展的综合反映。辛亥革命以后,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工业进入发展时期。从 1914 年至 1924 年,民族资本机器工厂从 91 家增加为 284 家,已开始为出售而生产制造车床,仿造内燃机,并扩大了纺织机器的修造队伍,从而保证和促进了上海及江、浙一带的纺织、缫丝和丝织业的发展。1925 年以后,随着倡用国货活动的开展,民族资本的卷烟、橡胶、丝织、针织、搪瓷、印刷等业进一步发展,机器制造业也扩展了生产范围,从事各种行业的机器仿制。30 年代以后,随着一些行业的不景气,机器生产也遇到一些困难,行业的营业额下降,新设厂数在减少,一些企业难以维持,但整个行业仍在艰难中发展着。具体情况见下表。



图 1-4 缫丝厂的女工和童工在操作

表 1-7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各阶段厂数比较表(1913—1937 年)

年份	纺织	印染	缫丝	丝织	针织	动力机 农机	工作 机	船舶 修造	印刷	卷烟	修配 及其他	合计
1913	5	—	8	—	3	16	—	19	7	—	33	91
1924	32	6	10	2	39	48	10	34	18		85	284
1931	45	9	3	16	41	70	8	51	32	7	175	457
1937	62	14	3	18	48	71	11	54	41	9	239	570

资料来源: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55、528—529页表列数字综合。

## 二 多功能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发展,带动了上海的内贸、交通运输、电讯通信、金融和工业的发展。内外贸易、交通运输、电讯通信、金融及各工业部门的发展又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以致形成了巨大的经

济凝聚力量,使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多功能经济中心。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和全国各地经济的密切联系上。20世纪20年代时,上海的对外和对内贸易都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牢固地确立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它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三百多个港口有着贸易往来,对外贸易值始终要占全国总额的50%左右。例如在1931年时,上海的进出口总值达13.79亿海关两,占全国进出口总量23.42亿海关两的5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与此同时,上海在国内贸易中也成为埠际贸易的中心。进口的洋货大多经由上海再输送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而内地的土产,无论是杭嘉湖平原的丝、浙皖附近的茶,乃至远在四川等地的猪鬃、桐油,以及内地的各种土产也要到上海集中,然后再转运出口。据海关轮运的统计,1936年时,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为8.9亿元,竟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这种数额巨大的埠际贸易量依靠着从上海至内地十分畅通的贸易渠道,又通过上海众多的商品交易市场,控制着内地市场商品的价格,平衡着销售和收购双方的供需。那时,全国各地的商帮都来沪开设从事批发业务的行号。据1918年的统计,这种外地商帮的批发号已达340家,其中四川帮约74家,集中于福州路;汉口帮58家,集中于广东路、汉口路;广东帮46家,集中于江西路、四川路;山东帮42家,集中于山东路、爱多亚路<sup>[17]</sup>。当时法租界的公馆马路两侧的道路则集中着国内津帮批发号16家,闽帮批发号10家,广帮批发号7家,其余还有豫帮和瓯台帮等共37家。<sup>[18]</sup>

近代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得力于城市发达的交通运输和电讯通信的配合。早在20世纪初,上海已形成了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航线的水路运输网。与航运相关的港口设施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也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海港,并被列为世界十大港口之一。上海的港口运输吞吐能力始终在全国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据海关统计,1931年时,进出上海船只20795艘,总吨位达37972893吨,占全国总吨位数的23.73%。至1936年时,进出上海船只16481艘,船只总吨位为3181025吨,也占全国总吨位数的21.94%,即五分之一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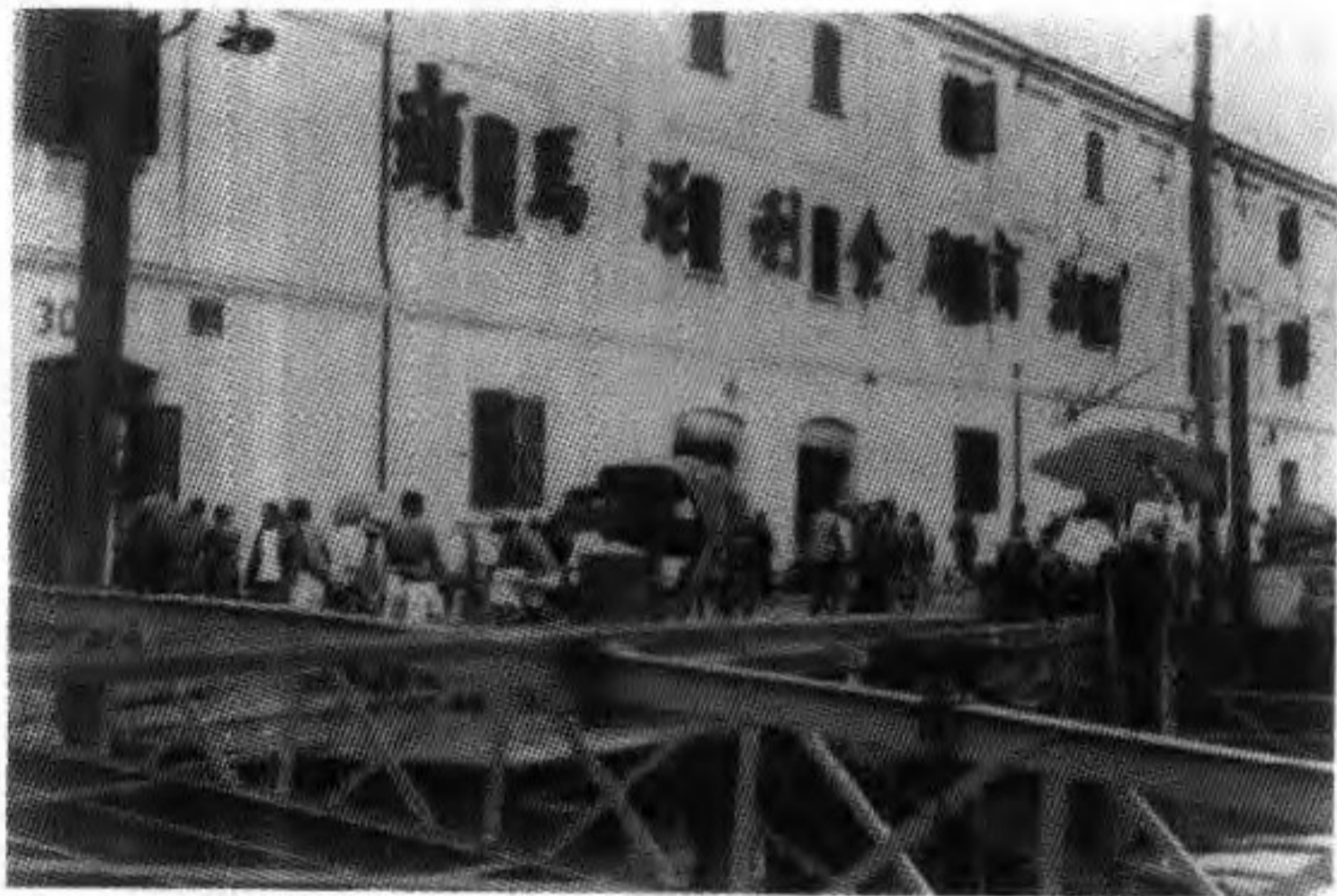


图1-5 轮船招商局的码头和浮栈

电讯通信方面,随着电报技术的发展,原来通过陆路和水线收发电报的方法逐渐被无线电台所取代。1928年以后,上海地区的无线长波电台均采用新式的真空管短波无线电机,在质量和技术上都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1929年,上海至菲律宾马尼拉的国际无线电报开通,这是上海最早开通的国际无线电台。它结束了外商在中国垄断国际电信事业近60年的历史,在中国电信史上有重要意义。1930年上海国际无线通信大电台建成后,首先开通了中美电路,后又开通了中法、中德电路。1923年,上海最早开通了国内长途电话,1936年,又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1926年开办的上海至吴淞长途电话,每3分钟收费银元1角,至苏州为4角,无锡为7角。1927年开通的至南京的长途电话费每3分钟为一元伍角。在市内用户方面,在

30年代上海的电话用户已发展到2.6万号线,整个上海的电话系统由人工接线改制成旋转制电话,加速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样,一个从上海市内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电讯通信网络就初步形成了。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金融市场也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如有关金融史的专家所论定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稍后几年,是上海金融业顺利发展和奠定基础的黄金时期”<sup>[19]</sup>。据统计,在1911年时,上海华商银行的存款总共还不过1亿元,而在1921年,上海一些重要银行的存款总额就已近5亿元<sup>[20]</sup>。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因市场开拓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不惜向银行和钱庄借款开厂,在1915—1921年期间,仅荣氏集团就用这个办法开办了申新一至四厂共4个纺织厂。1920年,上海开设了证券物品交易所。1921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始营业。同一年,上海标金(即黄金)交易所也开始营业。

由于上海华资银行功能的增强,信用的扩大和存款的增加,加上市民反帝情绪的高涨,至1925年时,上海金融业内外资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三者之间的资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金融总资力外资银行占36.7%,华资银行占40.8%,钱庄占22.5%,可见华资银行在上海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sup>[21]</sup>

至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上海的金融市场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对上海27家主要银行统计,其银行存款总额由1921年的5亿元上升到1936年时的40亿元左右。一批大银行基本上完成了在内地重要城市开设分支行的计划,据统计,总行开设在上海的58家银行中,有28家在内地开设了629个分支机构和数千个通汇点。另外一批重要银行也在20年代将其总行从北京等地迁移至上海,正式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金融网。据1935年的资料,当时全国共有银行164家,总行设在上海的就有58家,占35%。在上海的43家银行公会会员银行中,有35家总行在上海,占这些著名银行总数的81%。如果

加上其他银行在上海开设的分支机构,上海的银行机构达 182 个。此外,上海还拥有 11 家信托公司,48 家汇划钱庄,3 个储蓄会和 1 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在 30 年代中期,在上海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的营业资力(已缴资本 + 存款 + 公积金 + 兑换券)共计达 327191 万元,占全国金融资力总数 683920 万元的 47.8%。那时,上海的金融机构对全国市场的资金调剂和融通,起着中心枢纽的作用。各地的利率、汇率和金银外汇的行市也以上海为依据。上海的证券所、标金和外汇等交易所的行市对全国有重大影响。当时,上海金融市场的广泛辐射能力可以从内汇市场中看出来。那时上海钱庄开出的庄票或汇票,由于最终付款地为上海,故也被称为“上海头寸”,十分坚挺。在内地,人们只要有了申汇,也等于有了现金。就是连各城市之间的内汇市场,如天津与汉口或汉口至重庆之间的汇划比率,都不是直接以这些城市之间的相关因素决定,而主要是依据这些城市对上海申汇行市的比率来计算。这些城市之间银根的松紧,放款的多寡,都受上海与该城市间资金的流动影响,各城市之间债务的结算,也往往要通过上海进行资金调拨。于是,上海就真正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发达的城市工业是 20 世纪以后使上海成为全国埠际贸易中心的基础之一,也是上海近代成为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的重要表现。如前所述,上海近代工业在国内起步最早,而且始终在国内产业的发展转换过程中起着领先和带头的作用。不少新兴的企业和产业首先在上海产生和集中,并对全国各地产生示范作用。据对国内有关机器制造企业调查,1911 年拥有 30 名工人以上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上海有 48 家,至 1933 年时,这种正规的机器制造企业增加为 3485 家,占当时被统计的全国 12 个大城市中总数的 36%,即上海的正规工业企业占全国主要大城市中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上海的这些工厂资本总额为 19087 万元,占全国主要大城市中资本总额的 60%。上海的这些工厂的生产净值为 72773 万元,占全国主要城市中生产总值的

66%。至1947年时,上海的这类机器制造企业发展为7738家,占全国12个大城市中总数的55%。

以个别行业而论,像近代中国发展较早较多的棉纺织业,上海集中的特征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早在20世纪前,上海的华商纱厂在全国六大华资纺织业城市中就独占鳌头,其设备和资本要占全国总数的50—60%左右。20世纪以后,由于其他城市纺织业的兴起,上海所占的比重略有下降,但一般也占30%左右,高时可达40%,一直是近代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之一。

在1933年,上海按工业产值大小计算排列的主要产业次序如下:第一,棉纺织业,产值为36367.9万元。第二,卷烟业,产值为11994.3万元。第三,面粉业,产值为11356.9万元。第四,水电气业,产值为8387.7万元。第五,化学工业,其中包括火柴制造、制药等,产值为5285.9万元。第六,机器及金属制造业,其中包括船舶制造等,产值为5257万元。第七为造纸印刷业,产值为4126.4万元。第八为服用品制造业,产值为3337.2万元,第九为橡胶制造业,产值为3193.5万元。以下还有毛纺织业、缫丝业、皮草制品制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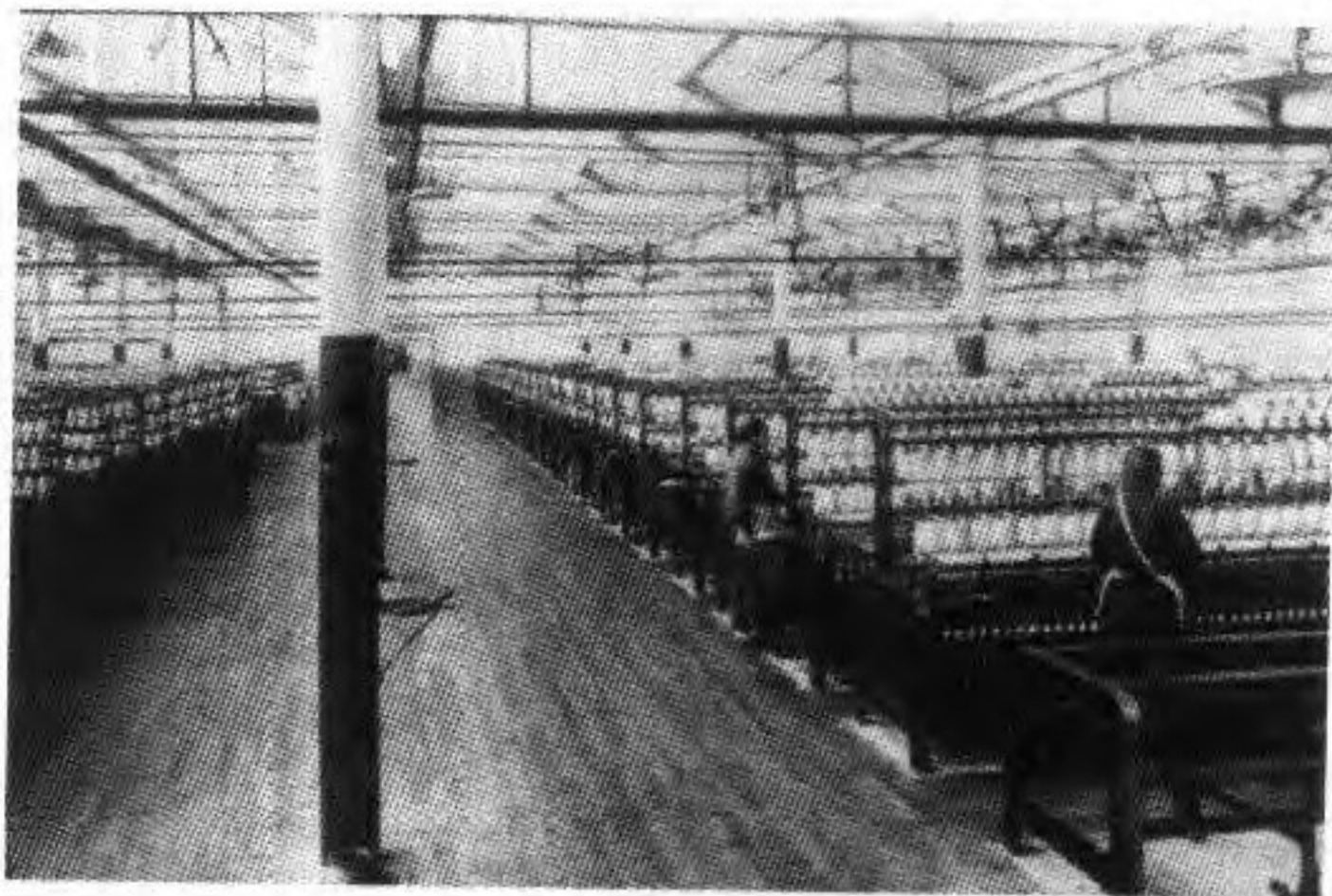


图1-6 20年代上海新式的纺纱车间

1933年时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为10.5亿元。<sup>[22]</sup>

由于上海工业的初步发展,像杨树浦、闸北、沪西和沪南等一些工业区也初具规模。杨树浦工业区除了原来有的华盛纺织总厂、怡和丝厂、英商自来水公司等以外,还集中了华新、大纯、振华等纱厂和一些烟厂,日商也在这里开设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一厂等,纺织工业成为其主要产业。在闸北工业区,除了原来的商务印书馆外,还有皂厂、机器厂和缫丝厂,著名的闸北水电公司也在这里。在沪西有名的大隆铁工厂、立大面粉厂,以及罐头食品厂和榨油厂等,日本的内外棉株式会社三厂也开设在这里。在沪南工业区,则以民族资本的弄堂工厂聚集而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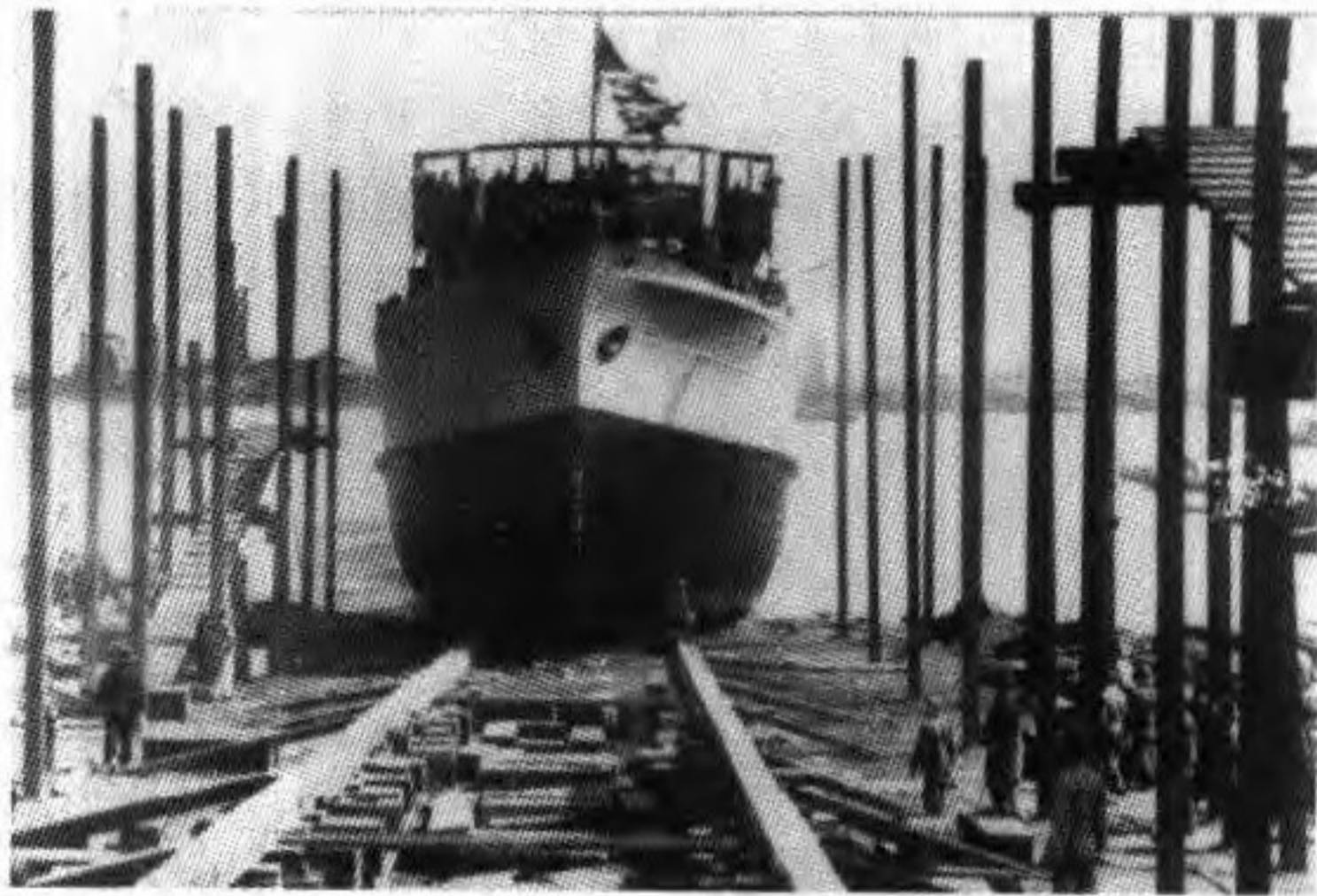


图1-7 民生轮在船厂下水的情景

至1936年左右,上海的工业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全年的总产值达到11.8亿元,比1933年时还多1.3亿元。现将1911年至1936年时上海各工业行业产值发展概况列表如下:

至30年代时,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也形成了上海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